

# 阿佤山的“红色烙印”

本报记者 李春林 吴沛钊 文/图

临沧地处祖国西南,作为连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门户大通道,百年间一直是反抗外敌侵略、捍卫领土完整的最前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年间,临沧各族群众团结一心,从抗战御辱戍边守土到各族群众脱贫奔小康过上幸福新生活,书写了一曲“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辉煌篇章。



## 双江 打响辖区革命武装斗争“第一枪”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因澜沧江和小黑江流经而得名,奔流的两江在大文乡脚下相遇,滋润出一片沃土,也孕育出临沧地区第一支人民武装队伍。

1948年9月,为配合全国解放斗争,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出地下党员李培伦、“民青”成员魏文才、“新联”盟员王维人来到双江、沧源一带开展革命工作。经3人调查研究,认为双江圈控(今大文乡)南临是建立游击武装的理想据点。李培伦等人

与圈控著名爱国人士浦世民接触后,双方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49年2月中旬,李培伦与浦世民和刀三等人共同建立了由汉族、傣族、拉祜族、布朗族等150多人组成的临沧地区第一支革命武装——双江圈控人民游击武装。2月27日,圈控人民游击武装和景谷方面派来的50多人,正式集合在圈控营盘村的一棵大榕树下,召开了1000多人参加的庆祝成立和起义宣誓大会。

在进行完“要英勇杀敌为穷人翻

身求解放”的宣誓后,起义军首攻德胜乡公所(大文乡)取得了胜利,缴获一挺机枪及10多支步枪。2月28日,起义队伍兵分两路进攻南协弄乡公所,由于敌方早有防备未克,部队撤回圈控整编,当地群众纷纷报名参加,短时间内部队迅速发展到了300余人,编为三个中队。

起义部队被编入中共“回国党组”领导的“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第八大队。同年5月,第八大队在临沧被改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卫

军”第二纵队十一支队第八大队。队伍先后参加了追歼澜沧反动土匪、进军耿马、緬甸保卫战、马台阻击战、三棵桩阻击战等战斗,战功卓著。圈控武装起义是临沧地区打响的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圈控起义的第一声枪声,在临沧树起了武装革命的红旗,点燃了武装革命之火,壮大了滇西南革命武装力量。1999年8月圈控起义发生地双江县大文乡,被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认定为革命老区乡。

## 临翔 打造绽放新时代光彩“会客厅”

夏日的临翔区博尚镇,花海景区各色鲜花纵情开放,到处是游人的欢声笑语。乘上乡村振兴快车,博尚在发展乡村旅游上走在前列,已然成为“临沧的会客厅”。

而70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两场举足轻重的革命战斗。第一次博尚战斗使得緬甸革命政权得以开辟,而第二次博尚战斗则成功保卫了新生的緬甸人民政府。

1950年9月,第一次博尚战斗胜利,緬甸城(即临沧城)刚解放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及各种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妄想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当时已溃败到境外的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联合耿马反动土司罕裕卿、原国民党政府緬甸专员彭肇模、云县悍匪张

国柱,纠集了土匪武装千余人,成立了“滇西联合军政委员会右翼指挥部”,分左、右两路向勐永、博尚进犯,伺机进攻临沧城。

9月27日,左路由张国柱带领向勐永进攻緬甸新城。张国柱自知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为保存实力龟缩耿马,解放军兵分两路合击张国柱部队。而此时,杨成之带领的右路匪军乘虚而入,从双江方向出发奔赴緬甸,攻占了博尚镇。

敌众我寡,情况异常紧急。时任县委书记张树栋派人火速将消息报告人了解放军第十四军四十师一二〇团副政委赵世英。10月1日,赵世英集结兵力对盘踞在博尚镇的土匪发起总攻,攻下了勐准大玉地后,土匪节节败退,

向观音寺逃窜,解放军乘胜追击,包围并占领了观音寺。接连失利的敌人吓得向博尚河底逃窜(今博尚水库位置),最终经过奎岗山(今永泉位置)发生激烈战斗,被埋伏在那里的解放军击溃,匪首杨成之负伤而逃。

第二次博尚战斗,以解放军一二〇团大获全胜、蒋残匪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战斗中击毙杨成之部下二大队队长刘继元、三大队队长刘继唐及部属250余人,俘虏匪首王道先、马玉堂、李兰平及余下150余人。

第二次博尚战斗保卫了新生的緬甸人民政权,消灭了右路之敌杨成之部,给耿马、双江一带的土匪以沉重的打击,为緬甸县征粮建政、清匪反霸等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解放双

江、耿马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博尚战斗中,15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二〇团解放军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他们中有7位是党员,平均年龄24岁,年龄最小的仅有19岁。

1951年,为缅怀牺牲烈士,建立了博尚烈士陵园。近年来,博尚依托红色资源,通过建设博尚战斗纪念馆、红色镇史馆与规划馆、全市第一所乡镇一级党委党校;打造由机关退役士兵制作红米饭、南瓜汤等“红色菜肴”;培养一支以机关年轻党团员和退役士兵为主的解说以及后勤保障服务保障队伍,精耕出一套乡村红色旅游模式。自2018年以来,先后为近800多家各级驻临单位、企事业单位,2.5万人红色套餐服务保障提供红色旅游服务。

中尽最大努力争取协商。最终,双方达成关于边境问题的平等友好协议,历时66年多的中、緬边界问题得以彻底解决,班老、班洪等地顺利回归中国。

时光变迁,今天的边疆人民依然忘不了当年的故事,胡玉堂后人胡志辉向我们讲述:“我们一直坚守着‘佤族汉族是一家、九老九代不丢佤’的族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感谢共产党带领我们从贫穷走向了富裕,我们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恩泽。”

在边境线上,戍边守土的历史责任也从未停止。肖中华是班老乡一名外事界务员,担任职务25年来,他每天要负责巡逻15.8公里的国境线。“以前山路不好走,尤其到了雨季,山高坡陡,更加危险,但是为了边界的安全稳定,再困难我们也会坚持。”

在临沧各地,各族群众正在党的光辉下,手拉手心连心投身家乡建设,参与并见证着边疆安宁、祖国繁荣的时代巨变。

## 红色故事

## 维护边疆安宁的末代头人

保洪忠出生于爱国世家,其父亲是组织群众抗英保土的著名佤族爱国人士保卫国。20世纪50年代末,他曾和父亲两次到緬甸参加谈判,坚决维护国土完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目睹父亲抵抗英国侵略者、坚守领土寸土不让的事迹,保洪忠从小就有了强烈的爱国热忱。他牢记父亲临终前“我们世世代代都是中国人,只有靠中国才有出路”的叮嘱,在抵制种种诱惑,矢志维护祖国统一的路路上坚守终生。

1960年,中緬两国划定了中緬边界。然而,敌对势力一直妄图分裂班老等中国佤族地区,他们通过煽动、引诱等手段,企图把班老地区的头人、群众拉拢到境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从未间断。保洪忠刚接任班老头人时,敌对势力便加紧了对班老群众的引诱和拉拢,多次遭到保洪忠严词拒绝。

20世纪80年代中期,境外部分佤族组织了“佤联军”,还制定了建立“佤族联合共和国”的纲领,许多头人,包括其在境外的堂弟多次到班老请他参加佤族共和国,保洪忠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他说:“我是中国人,根在中国。”

即使到了“文革”特殊时期,虽然保洪忠及家属受到了孤立和错误批斗,境外分裂势力纷纷来劝说他离开班老,许诺让他做官,但保洪忠丝毫没有动摇,主动接受劳动改造,做着脏里打扫牛厩等最脏、最累的活。他始终没有动摇对共产党的依赖和社会主义信念。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他担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积极反映社情民意,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关注地方发展。为了解决牲畜饮水问题,保洪忠亲自和水利部门的技术员爬山砍刺寻找水源,通过提案的形式逐步向各级政府要求,还亲自去北京争取资金。在国家的扶持下,自来水引到了寨里。

此前,班老新区没有学校,保洪忠积极发动群众建盖校舍,校舍建起来又发动本村群众送子女上学。

回顾保洪忠的一生,他号召佤族群众坚定不移地爱祖国跟党走,积极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争取项目资金支持地方各项建设,在竭力维护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同时,努力促进了边疆的繁荣和进步。

本报记者 李春林 吴沛钊

## 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

## 永德 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本报讯(记者 李春林 吴沛钊 通讯员 李建光 穆永耀) 时值烤烟生产黄金期,为帮助广大烟农抢抓时节完成烤烟种植任务,永德政法系统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将党史学习教育延展的主体责任落实到田间地头、烤烟生产各个环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帮助8个种烟乡镇52个村的群众解决急难愁

盼问题。

永德政法系统688名干警实行基层社会治理挂乡包村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上门为行动不便的群众办理身份证、走访社区解决邻里之间的疑难杂症等,让便民服务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干群心贴心,共解决1737件大小小民生问题。

## 云县 用好老资源开创新形式

本报讯(记者 李春林 吴沛钊) 云县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用好本土资源、创新学习形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持续提升”。

云县切实用好本地固有红色资源,精心设计推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神”学习体验和红色旅游路线。广泛组织党员干部到滇缅铁路遗址园、茶房革命老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李珪故居和各乡镇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等红色资源教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让党史学习“活”起来。

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组织干部群众

多渠道学党史。忙怀乡利用“周一大讲堂”学习平台,组织干部职工开展“百年党史·每周一学”专题学习活动。县商务局与市商务局采取“支部+支部”的方式到云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开展“跟着总书记学党史”专题读书会,以党史学习教育助推商务工作。县纪委监委打造学习党史教育“微课堂”,在“清风云县”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党史相关内容。全县中小学开展“百名校长讲党史”活动,通过主题班会队会、国旗下讲话、党史宣讲团进校园等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 耿马 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讯(记者 李春林 吴沛钊 通讯员 李永祥)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急群众所急,解群众所忧,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实实在在转化为基层群众办实事的实效。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结合挂包联系制度深入基层一线,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等重点民生实事展开走访排查调研,通过进村入户,体察民情民意,近距离倾听群众所需所求、多渠道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形成调研报告800余篇,制定年度“民生实事计划”300余项。

## 亲历者说

## 武思秀 79年的红色回忆

“红军到过我们村一次,他们说‘过去是财主,地主压着穷人,现在要反过来,群众起来要压垮地主’,最后就把地主家的仓库打开,给穷人分粮食,这是我第一次见红军。”95岁高龄的武思秀老人,参加革命至今已79个年头,对许多年前见到红军的场景仍记忆犹新。

家住镇康县南伞国门边,清晨升旗旗仪式传来的国歌声,是武思秀每日必听的功课。“那一次红军之行,为穷苦人民和中国的红军形象深深留在了我的心中。”

武思秀16岁加入八路军,入伍后由于表现突出,他很快成为党组织培养的对象。由于在外打仗常年杳无音信,武思秀的家人一度认为他已经牺牲。“1947年我回到家,看见供桌上献着两碗饭。等我父亲挑水回来,推开门看见我,才把饭碗收起来。”

据老人回忆,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他所在的两野四兵团进军大西南。史料记载,1950年4月5日镇康和平解放后,在新县政府中任职的李文焕叛逃后曾率百余人南伞骚扰,121团9连

副连长武思秀带领两个班连夜奔袭,俘敌10余人,缴获骡马80余匹。

“和平解放前,我到南伞刷布厂跟李文焕谈判,我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手枪挎着,子弹上着,手榴弹挂着就去了。”所幸,这是一次和平谈判,语气给我们说着当年剿匪的经历,老人颇为慷慨激昂。

在滇西南解放战场上,武思秀和他所在的121团驻守在祖国西南边陲,立下过汗马功劳。1960年中緬联合勘界中,时任镇康县外事副县长的武思秀又作为勘界小队副组长参与其中。

如今,武思秀一家已是四世同堂,武思秀和妻子恩爱如故,儿孙们对他们孝顺有加。

“现在,我重孙在临沧读书,他说从临沧到南伞要4个小时,我说我们那时候得走8天,将来还会建设得更好。你们就是将来建设的人才,将来一定要当个不朽的螺丝钉。”武思秀再次抬头凝望着南伞国门,五星红旗准时升起的方向。

本报记者 李春林 吴沛钊  
通讯员 董文静 李元兰 王玲 谢华山



班洪抗英纪念馆的雕塑